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

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

DUNHUANG  
YANJIUYUAN  
XUESHUWENKU

樊锦诗 / 主编  
敦煌研究院 / 编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L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

敦煌研究院 / 编

樊锦诗 / 主编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  
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 樊锦诗主编.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423-2602-7

I. ①敦… II. ①樊… III. ①敦煌石窟—文集②喇嘛宗—宗教艺术—文集 IV. ①  
K879.214-53②J19-53③B94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58277 号

责任编辑: 吉西平

责任校对: 白鑫

封面设计: 徐晋林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樊锦诗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7.25 插页 4 字数 640 千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423-2602-7 定价: 98.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 “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总序

樊锦诗

敦煌学从研究对象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也称为敦煌文献、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二是敦煌石窟,三是敦煌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

1900年敦煌莫高窟第17号洞窟(后被称为“藏经洞”)所藏的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纸本、绢本绘画品始见天日,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未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致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流落海外。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敦煌文献受到世界汉学研究者的关注,很多学者投身于敦煌文献及艺术品的研究。敦煌文献包罗万象,涉及古代政治、经济、文学、语言学、科学技术等领域,一百余年来,有关敦煌文献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敦煌学”这一名称也源于对敦煌文献的研究。而随着对敦煌文献研究的深入,必然需要对敦煌本地历史、地理及相关遗迹进行调查研究。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敦煌的历史又与中国西部发展,特别是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相关联,因而,对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敦煌石窟的研究相对较晚,虽然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对敦煌石窟作过编号,并对洞窟内容作了详细记录,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也对莫高窟作过测量和记录,但伯希和除了上世纪30年代在法国出版过图录外,他的《敦煌石窟笔记》迟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正式出版,而奥登堡探险队的洞窟测绘记录则到了上个世纪末才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敦煌地理位置偏远,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到敦煌石窟的实地考察很难。当伯希和出版了敦煌石窟图录后,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因此写成了第一部敦煌图像考证的专著《敦煌画の研究》(1937年出版),但作者却一辈子没有到敦煌石窟做过实地考察。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先生为

首的一批研究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对敦煌石窟进行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除了美术临摹与研究外，还加强了石窟保护工程的建设，并开展了考古研究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了研究人员，并在石窟的科学保护、石窟考古、石窟艺术以及敦煌文献研究方面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力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敦煌莫高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其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国家不断投入资金，支持敦煌学研究事业，国内外友好人士也给予广泛的援助。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也不断发展。可以说敦煌学研究工作进入最好的时代。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在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奋进，并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人员陆续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学术研究项目的立项，敦煌研究院也设立了院级学术基金项目，加大了对学术研究资助的力度。

为了让新的研究成果尽快出版，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事业，我们决定持续地编辑“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遴选出能代表本院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陆续出版。“敦煌研究院学术文库”以推动敦煌学研究为宗旨，所收的著作，要在敦煌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上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启发性，对敦煌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敦煌研究院将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努力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持续向前发展。

## 目 录

- 《旁塘目录》与敦煌密教 ..... 田中公明(1)
-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in Mogao and Yulin caves,  
a reliable criterion for dating ..... Yoshiro Imaeda(7)
- 密教“心月轮观”的学理与实践——以敦煌石窟为例 ..... 郭祐孟(9)
- 谁主沉浮——莫高窟吐蕃时期《维摩变》的图式及其  
语境转换 ..... 罗世平(27)
- 中晚唐敦煌吐蕃式绘画刍议——兼议莫高窟第 14 窟  
北壁壁画 ..... 张亚莎(31)
- 工匠的语法与窟主的心声——关于蕃据时期敦煌石窟  
中屏障画的几个问题 ..... 邱忠鸣(45)
- 生天:《弥勒变》《天请问变》的流行与对应——吐蕃时期  
敦煌经变对应问题研究之一 ..... 王中旭(63)
- 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 ..... 魏健鹏(78)
- 小议敦煌壁画中的蕃装人物 ..... 马 德(94)
- 莫高窟吐蕃期洞窟第 359 窟供养人画像研究——兼谈  
粟特九姓胡人对吐蕃统治敦煌的态度 ..... 沙武田(109)
- 莫高窟第 361 窟的中唐供养人——莫高窟第 361 窟  
研究之三 ..... 赵晓星(139)
- 吐蕃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修筑者中的粟特人 ..... 郭 萍(158)
- 关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西方净土变》——以十六观图  
为中心 ..... 大西磨希子(171)
- 莫高窟第 154 窟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研究 ..... 于向东(188)
-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法华经变》小考——以莫高窟第 159  
窟为中心 ..... 下野玲子(201)
- 敦煌莫高窟吐蕃统治时期的《金刚经变》研究 ..... 刘 颖(213)

- 瓜州榆林窟第 3 窟恶趣清净曼荼罗及相关问题 ..... 刘永增(231)
- 敦煌吐蕃时代的文殊菩萨图像探讨 ..... 陈清香(236)
- 敦煌中唐不空绢索与如意轮观音图像 ..... 张 总(261)
- 莫高窟吐蕃时期的千手千眼观音变——以眷属图像  
表现为中心 ..... 滨田瑞美(283)
- 榆林窟第 25 窟药师佛及其相关问题——兼论正壁的  
卢舍那佛与八菩萨 ..... 赖文英(301)
- 从敦煌莫高窟及瓜州榆林窟的孔雀明王看归义军节度使  
曹氏对密教的接受 ..... 桥村爱子(316)
- 芒康、察雅吐蕃佛教石刻造像 ..... 张建林 席 琳(342)
- 11th Century Wall Paintings in the Caves of Dungkhar (Ngari):  
Stylistic Influenc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icularl Dunhuang  
..... Helmut F. Neumann and Heidi A. Neumann(356)
- 俄藏黑城出土西夏水月观音图像研究 ..... 郑怡楠(365)
- 图像辨识习作之一——以榆林窟第 25 窟前室毗沙门天图  
阶段性认识为中心 ..... 李 翎(375)
- 敦煌兜跋毗沙门天王像刍议 ..... 彭 杰(399)
- 关于敦煌、四川地区的毗沙门天王像并列、对置范例  
——公元 9 世纪吐蕃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初探 ..... 大岛幸代(409)
- 从藏传佛教看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佛教艺术 ..... 黄英杰(420)
- 敦煌莫高窟第 465 窟图像结构之分析 ..... 林怡慈(449)
- 莫高窟第 465 窟藏文题记再释读 ..... 勘措吉(463)
- 莫高窟中唐第 231、361 窟吐蕃建筑画研究 ..... 孙毅华(472)
- 瓜州东千佛洞西夏壁画艺术 ..... 李宏伟(486)
- 敦煌石窟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绘画艺术 ..... 桑吉扎西(490)
- 敦煌石窟吐蕃时期壁画“农作图”及其有关的问题  
..... 王进玉 王 喆(505)
- 山西青龙寺取经壁画与榆林窟取经图像关系的初步分析  
..... 于 硕(518)
- 吐蕃艺术名物丛考 ..... 扬之水(533)
- 吐蕃敦煌抄经纸张 ..... 张延清(573)

四川洪雅县藏唐敦煌本《大般涅槃经》考 ..... 王一鸣(584)  
编后记 ..... (589)



## 《旁塘目录》与敦煌密教

田中公明

(日本·东方学会)

### 一、序言

笔者作为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的助手,在任期间,曾参与策划了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出土藏文文献的编辑<sup>①</sup>工作,又在《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伯希和藏品》(I)刊行时<sup>②</sup>,为敦煌出土密教绘画图像做了比定工作,主要对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及河西走廊一带盛行的密教美术进行了研究。笔者与敦煌密教相关的研究成果,汇集在《敦煌密教与美术》<sup>③</sup>一书中。而且令人欣喜的是,本书中的两篇论文,已由刘永增先生译成中文发表于《敦煌研究》<sup>④</sup>,不仅在中国,而且使可以阅读中文的海外研究者也了解到笔者研究的一个侧面。

不过在此之后,随着藏学以及敦煌研究的进展,对本书中的几点内容有必要进行一些补充和订正<sup>⑤</sup>。

①《スタイン搜集チベット语文献解题目录》第9~12分册,东洋文库チベット研究委员会,1985—1988年。

②《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I),讲谈社,1994年。

③田中公明《敦煌密教与美术》,法藏馆,2000年。

④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寂静四十二尊曼荼罗》,《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田中公明著,刘永增译《敦煌出土莲华部八尊曼荼罗》,《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同

③,第三、六章的中文译文。而且据说刘永增先生还将在《敦煌研究》再刊登一篇。

⑤《敦煌密教及美术》第二章中,所举出的关于安西(现瓜州)榆林窟第25窟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像,敦煌研究院的沙武田先生发表了右侧已失壁画的复原研究。以西藏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作例,拙作中介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昌都摩崖佛和青海省贝勒沟大日如来堂像以外,对很可能为吐蕃时期造像的几件作品进行比定。而且,在东千佛洞又发现有第四章所举出的不空绢索五尊的新的作例。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以后的文章中介绍。

特别是在拉萨的西藏博物馆藏古写本中，发现了古代吐蕃王国的经录《旁塘目录》(dKar chag 'phan than ma)，并于2003年与《声明要领二卷》(sGra sbyor bam po gñis pa)同时刊行，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众所周知，作为吐蕃的经录，过去已知有《邓噶目录》。但是《邓噶目录》中除初期密教系的陀罗尼经典类和《大日经》《恶趣清净怛特罗》等经典以外，并未收入后期的密教经典。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吐蕃时期还未出现《初会金刚顶经》以及后期密教经典。

但是，在敦煌出土的藏文密教文献与密教绘画中，发现了基于《初会金刚顶经》系的瑜伽怛特罗、《秘密集会》、《摄相应瑜伽》(Samāyoga)等成立较早的后期密教系原典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术作品。

对此，《旁塘目录》中收有《邓噶目录》未收录的密教经典及其注疏，进而言之，其中还收录了西藏撰述的密教文献，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吐蕃时期在西藏传播的密教的实际形态。令我们惊叹不已的是，笔者在《敦煌密教及美术》一书中言及的在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的几个文本，在现行《西藏大藏经》中未见收录，相反却见于《旁塘目录》。

就此，本稿就新发现、刊行的《旁塘目录》，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研究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作如下考察。

## 二、迄今为止的《旁塘目录》研究

如上所述，《旁塘目录》的写本至今未曾被知晓，由于布敦在《西藏大藏经目录》中引用过其中的一部分，因此《邓噶目录》和《旁塘目录》的成立先后，一直就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旁塘目录》的刊行在日本也同样受到关注。川越英真先生将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旁塘目录》转写成罗马文字，同时出版了加以文献编号及详细注记的校订本<sup>①</sup>《dKar chag 'Phang than ma》。川越先生还就其内容加以考察后发表了论文<sup>②</sup>。本稿中在言及《旁塘目录》所收文本时，使用川越先生附加的KP号码。

川越先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邓噶目录》所收多达70部典籍在《旁塘目录》中都未见收录，而且，关于《大宝积经》的配列，《邓噶目录》与现行的《西藏大藏经》几乎一致。相对于此，《旁塘目录》的《大宝积经》部类中却

①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 ma》，東北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2005年。

②川越英真《〈パンタン目録〉の研究》，《日本西藏学会会報》第51号，2005年。

仅见有 9 部经典,其他经典散见于其他部类中。

这些都暗示了《旁塘目录》的成立早于《邓噶目录》,如前述,关于密教《旁塘目录》包含了《邓噶目录》中未收录的很多文本,川越先生也保留了对两者成立先后关系的最终结论。

另外,山口瑞凤博士把布敦(1290—1364 年)的《西藏大藏经目录》中抄写的“中观难语吟味”dBu ma'i dka' dpyad bsad pa dan bcas pa(NS. 2933)<sup>①</sup>“中道的勅令及解说”dBu ma'i bkas bcad bsad pa dan bcas pa(KP.827)的作者 btsan po dPal dun brtan(《旁塘目录》中为 dBa' dun brtan)与赞普达玛 Dar ma 'U'i dum brtan(达玛乌冬赞)看作是同一人,也就是说,将《旁塘目录》的成立定为在赞普达玛被暗杀的公元 842 年之后<sup>②</sup>。这样的话,同目录序言中所记成立年代为“王于成年居旁塘宫时”,是在赞普达玛被暗杀之后,亦即欧松王(842—905 年)统治包括旁塘宫在内的雅砻地区之时。但是,若考虑到序言中所记作为编者的 sKa ba dpal brtsegs(噶瓦拜则)为中心的活动年代,则有些失之太晚。

### 三、《旁塘目录》所收入的受关注的文献

下面,对《旁塘目录》中敦煌出土的密教文献与密教美术的关联加以考察。

拙作《敦煌密教及美术》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中介绍了基于《初会金刚顶经》“金刚界品”的《圣真实摄成就法》和基于“降三世品”的《金刚吽迦罗成就法》,同时,在卷末的“资料篇”中收录了转写的罗马字文本。

然而,此次刊行的《旁塘目录》中收有《金刚吽迦罗成就法》dpal rdo rje hūṃ gi sgrub thabs(KP.911)的仪轨。此外,S.519 的末尾记《金刚吽迦罗成就法》的标题为 rdo rje dpal hūṃ zes pa'i bsgrub pa bsdus pa。但是在 S.417 的卷首所示的梵文题目中,bsgrub pa bsdus pa 的原语为 sa du upai ka,即 sādhanopāyikā 已得到了确认。sādhanopāyikā 在钦定译语制定以后的藏文佛典中通常译为 sgrub pa'i thabs 或 sgrub thabs。因此,敦煌出土的《金刚吽迦罗成就法》与 KP.911 为同一写本,或者此文本很可能是以钦定译语为基础改订以前的旧译。

笔者又从《金刚吽迦罗成就法》的内容中推定,吐蕃时期的西藏,不仅

①布敦《西藏大藏经目录》中收录的文献 NS 号码;西冈祖秀《プトウン仏教史》目录部索引 I~III,《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施設紀要》第 4~6 号,1980—1983 年。

②山口瑞凤《ダルマ王の「破仏」は虚構》,《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紀要》第 18 号,1995 年。

有《初会金刚顶经》“降三世品”，而且其释怛特罗《降三世轨》<sup>①</sup>也已被知晓。《旁塘目录》中收录的《降三世轨》(KP.887)及其注疏(KP.888)<sup>②</sup>就证明了这一点。

P.292 中有《初会金刚顶经》的“金刚界品”，S.367 中也有该经“遍调伏品”一百零八名赞中的摘录。从这些事实中笔者推定，吐蕃时期在现行的仁钦桑布译本之前，既已有《初会金刚顶经》的藏文译本（至少包含“降三世品”“遍调伏品”），《旁塘目录》的发现使这一事实得以确认。而且《旁塘目录》(KP.884)中记载有“含续怛特罗” rgyud phyi ma dañbcas pa、“九卷” bam po dgu pa，与不空的汉译本不同，说明完整的四大品藏文译本在吐蕃时期已经成立。

又，拙稿《敦煌密教及美术》的第二章中，论及了过去认为是“阿弥陀八大菩萨”的大英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 50，应为胎藏大日八大菩萨。敦煌出土数件称为《伴有眷属毗卢遮那赞》 rNam par snañ mdzad 'khor dañbcas pa la bstod pa 的藏文赞，其中除毗卢遮那佛以外，还包括了八大菩萨和维摩、宝吉祥二菩萨以及降三世明王赞。

由于敦煌诸窟、榆林窟以及吐蕃时期的西藏遗存有数例胎藏大日和八大菩萨像都与该文献相关，这也引起了欧美研究者的关注。

此外，在布敦的《西藏大藏经目录》中，记有作为赤松德赞御制的佛典“圣毗卢遮那和释迦八大菩萨赞” Phags pa rnam par snañ mdzad dañ/ śū kya thub pa dañ/byañ chub sems dpa' brgyad la bstod pa (KP.670) 为题的文献。因此，根据《旁塘目录》的刊发，说明了布敦的这些记述也参照了《旁塘目录》。

除此之外，《旁塘目录》中还记载有著者不明的另一赞文“圣婆伽梵毗卢遮那佛及眷属八大菩萨各自的赞及其真言” Phags pa sañs rgyas bcom ldan 'das rnam par snañ mdzad 'khor sems dpa' brgyad dañbcas pa la so sor bstod pa dañ gzuñs snags dañbcas pa (KP.419)，敦煌出土的《伴有眷属毗卢遮那赞》很有可能即是后者。

①关于《降三世轨》(北 115)，参照《インドにおける曼荼羅の成立と発展》第四章注 13，春秋社，2010 年。

②推定为现行《西藏大藏经》中收录 Muditakosa 的注释(北 3332)，《旁塘目录》中未见有著者名。

但是,《伴有眷属毗卢遮那赞》的尊格构成,与赞普赤松德赞建立的桑耶寺乌策殿(中峰)1层、2层尊像的安置状况十分相似,可以说强烈地暗示了此赞文为赞普赤松德赞所做<sup>①</sup>。

敦煌也有出土其他的八大菩萨赞 *Byaṅ chub sems dpa' chen po brgyad la mñon par bstod pa* 的断片(No.360 VI),后者很可能为此文献。

#### 四、《旁塘目录》成立年代的推定

如上述,关于《旁塘目录》和《邓噶目录》的成立先后,过去一直有争议。川越先生指出的几点启示我们,《旁塘目录》成立早于《邓噶目录》,但是如上述,就密教而言其状况完全相反,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就此,笔者注意到川越先生将《旁塘目录》的 27-1~27-9(据川越先生分类)认为是后世附加的见解<sup>②</sup>。如此看来,《金刚吽迦罗成就法》《初会金刚顶经》的全译等,本稿中所举的密教文献之大半,都包含在《旁塘目录》成立后的增补部分之中。再则,由于山口瑞凤博士视为存在问题的 NS.2933(KP.827)也包含在增补部分中。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将《旁塘目录》主体的成立推到赞普达玛以后。

关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两目录中收入的全部文献进行详细的探讨,现阶段最为妥当的结论是,其成立时间的顺序为《旁塘目录》→《邓噶目录》→《旁塘目录》增补部分。

#### 五、结论

以上,本文对新发现、刊行的《旁塘目录》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有何种意义进行了考察。

结论是,从拙作《敦煌密教及美术》中讨论的文本以及敦煌出土的藏文密教文献和密教绘画的存在,确认了被推想为吐蕃时期已为人们所知晓的藏文译本,或者说与之相类似的内容、题名的文本即已存在。

但是,这些不存于《邓噶目录》,而在《旁塘目录》中存有记载的文本,很明显仅限于《大日经》《初会金刚顶经》系的密教经典中。《秘密集会》《摄

①关于吐蕃时期的胎藏大日八大菩萨的作例,见田中公明《チベットにおける胎藏大日如来と胎藏曼荼羅の伝承と作例について》,《聖なるものの形と場》,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

②川越英真《dKar chag Phang thang ma》,東北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2005年。

相应瑜伽》(Samāyoga)等较早时期成立的后期密教经典,在敦煌,尽管藏文译写本、断片有所发现却未见收录。这说明了《旁塘目录》遵守了色纳勒王发布的对后期密教经典翻译的禁止令<sup>①</sup>。即《敦煌密教及美术》言及的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中,《秘密集会》《摄相应瑜伽》(Samāyoga)乃至《秘密藏续》(gsaṅba'i sñinpo)等,现在西藏佛教中发展为宁玛派的古密教文本,应该考虑是在后期密教经典的翻译禁止以前就已经传播、翻译了。

这一事实,不仅阐明了吐蕃占领下的敦煌密教,对研究印度后期密教的成立和历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翻译:阮莉)

<sup>①</sup>关于后期密教经典的翻译禁止令,见石川美惠《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第4页,东洋文库,1990年;石川美惠《二卷本訳語釈-和訳と注解》第7页,东洋文库,1993年。

##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in Mogao and Yulin caves, a reliable criterion for dating

Yoshiro Imaeda

(Directeur de recherc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In my article entitled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in Mogao (Dunhuang) and Yulin caves” published in 2007 in *Nihon chibetto gakkai kaihi* 日本西藏学会々報 (Report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o. 53, p.89–99, I wrote (p. 92):

“A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hort note, I would suggest that the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 can be a reliable criterion for dating the caves or, to be precise their walls, to the period of Tibetan occupation of Dunhuang from 786 to 848 CE.”

After further reflection, I came to realise that this conclusion is valid only partially.

It indeed is valid for the frames filled with both Tibetan and Chinese inscriptions respectively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parts. This is the case with cave 365 of Mogao which has inscriptions both in Tibetan and Chinese, although the latter is heavily damaged. The Tibetan inscription is complete and allows us to date the cave to 832–834 CE during Tibetan occupation.

However in the case of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with no Tibetan inscription, the conclusion is not valid. This is the case with the east wall of cave 25 of Yulin, the temple of the Treaty–Edict (gtsigs kyi gtsug lag khang) constructed to commemorate the Sino–Tibetan peace treaty of 821/22 CE. The vertical portions of the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s on this wall contain Chinese inscriptions, but the horizontal parts which were originally intended for Tibetan inscriptions are devoid of text in all cases. (cf. my article, p. 90) One can conjecture that the painting of the east wall was com-

mission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peace treaty of 821/22 CE and the end of the Tibetan occupation in 848 CE, but was not completed during this period. By the time of its completion (which can not be determined), the Tibetan occupation was already over, hence there was no need to have Tibetan inscriptions.

Thus, the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 allows us to date the commission of the painting of the east wall to the period of Tibetan occupation but does not indicate the date of the real execution/completion of painting.

In the case of the south and north walls of the same cave 25, i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All inscription frames are vertical rectangles and none is T-shaped. This would suggest that these two walls were commissioned not during the Tibetan occupation like the east wall, but only after the end of the occupation, when it was no more imperative to have Tibetan inscriptions.

The presence of T-shaped frames on the east wall and their absence on the south and north walls indicate that their paintings were commissioned at different periods.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ave lasts for a rather prolonged period, sometimes several tens of years. Therefore, one can not attribute one and the same date to different elements: wall paintings, statues, etc. inside one and the same cave. Cave 25 of Yulin is an eloquent example.

My conclusion should be modified as follows:

“The T-shaped inscription frame can be a reliable criterion for dating the commission of the wall paintings to the period of Tibetan occupation of Dunhuang from 786 to 848 CE.”

Postscript:

This note is written i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scussions that I had at 2010 Dunhuang Foru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unhuang Cave Art of Tibetan Period. I thank Dunhuang Academy (敦煌研究院) for organizing this interesting and fruitful symposium and for its generous invitation and kind hospitality.



# 密教“心月轮观”的学理与实践

## ——以敦煌石窟为例

郭祐孟

(圆光佛学研究中心图像文献研究室)

### 一、引言

佛教诸派教学对于皆主缘起说,但是小乘谈业感缘起<sup>①</sup>,大乘法相宗谈赖耶缘起<sup>②</sup>,大乘法性宗谈真如缘起或法界缘起<sup>③</sup>,密教则主张六大缘起<sup>④</sup>,各有不同的特色。当然,诸家各执己见,以己为胜,这是可以理解的。密教自不能例外,以其六大缘起,摄一切诸法理事于阿字本不生际,而六

①根据《大毗婆沙论》卷二十三与《俱舍论》卷十三:业感缘起主张世间一切现象与有情之生死流转,皆由众生之业因所生起者,谈十二缘起。小乘诸宗皆主此说,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有情众生以身、语、意,日夜造作,所行善恶诸事虽于刹那间即幻灭,然所造之业必于现世或来世招感相应之结果;即因各类业力之复杂关系,遂形成此世界千差万别之现象。其后,主张唯识之诸宗更进而立赖耶缘起之说,并以阿赖耶识为业感缘起之根本。

②法相宗之唯识说,主张一切万法皆由阿赖耶识缘起,意译为藏识,有种子的意思;即微细不可知的藏识,能含藏一切诸法的种子,系一切有情之根本所依。因种子生现行,世间万象所以成立。如是,由本有种子、现行、新薰种子等三法之辗转相生,互为因果,而有“种子生现行,现行薰种子”之关系,世界因此生生不息。

③真如缘起,主要是依据《大乘起信论》而来,谓众生心识之阿赖耶识虽为发动宇宙一切现象的本源,然溯其根源,则为含藏真如之如来藏心;诸法系真如由无明之缘而起动,犹如海水本自湛然,然由风之缘而产生千波万浪,翻腾不已。法界缘起可见于唐智俨著《华严经搜玄记》,是华严宗基于《华严经》所立,主张万法相互融通,以一法成一切法,以一切法起一法,主伴具足,相入相即,并存无碍且重重无尽。

④密教的教义以地、水、火、风、空、识等六大为缘起之根本,立表德门,说宇宙万有之开展。谓六大乃一切万法之本体,周遍法界,所谓法尔本有、古今同然之存在。而六大之间有互具互遍之义,称“异类无碍”,即分六大为色心时,物即是心,心亦即是物,金、胎两部二而不二,不二而二。又A之六大与B之六大互具互遍,自在无碍,称“同类无碍”,即形成佛、菩萨等之六大,与形成地狱等之六大是一样的。此法尔之六大因缘而显现森罗万法,称为随缘之六大;乃法尔即随缘,随缘即法尔。